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www.npffund.org.cn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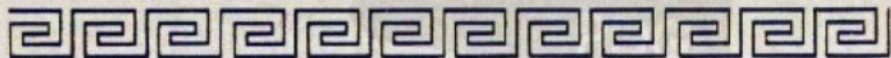
# 安 阳

李 济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安 阳

李 济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阳/李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8615-8

I. ①安… II. ①李… III. ①小屯文化—研究  
IV. ①K87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92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安 阳  
李 济 著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615-8

---

2011年12月第1版 开本880×1240 1/32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9 插页7

定价:29.00元

##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年12月



##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 目 录

自序	1
序言	4
第一章 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	7
第二章 探索阶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	17
1928年以前的私人挖掘	18
搜集活动	20
甲骨文字的出版和研究	23
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 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	35
第四章 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	54
第五章 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	81
位置、规模和构造	91
木椁	93
早期盗掘	94
祭品和“人牲”	95
重要发现物	99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小屯的最后三次田野发掘	102
地下居所和供贮藏用的窖穴	104
十三、十四、十五次安阳发掘的重大发现	110



车马葬	116
地下档案库(H127)	121
第七章 战时继续研究安阳发现物所取得的成果	126
第八章 战后的学术工作条件及安阳发现物的研究	145
第九章 史前遗物和有关古代中国的传说	163
第十章 建筑风格:建筑遗迹和地上建筑物复原之设想	178
地下建筑	178
地面上建筑的复原	187
第十一章 经济:农业和制造业——殷商王朝的农业和其他 自然资源	196
殷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199
手工艺、制造业和贸易	205
第十二章 殷商的装饰艺术	213
陶器	214
骨雕	218
石雕	222
青铜器	227
纹饰艺术的起源及某些特征	230
第十三章 谱系、贞人和亲族关系	232
第十四章 祖先及神灵的祭祀仪式	243
第十五章 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	250
参考文献	259
李济先生学术年表	李光谟 265
李济和他的《安阳》	李光谟 273

# 自序

1928至1937年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发掘所得的考古资料,自抗战以来已出版了几期《中国考古报告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奠定了新的基础。这批材料之所以重要有其一些理由,以下三点也许可首先考虑:

第一,当上个世纪末古物家开始知晓甲骨文时,甲骨文只被当作古董在小贩及古董商手中流传。学者们对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大多抱有怀疑。如民国初期一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就公开宣称这是伪造品,但也有几个严肃的学者发表了一些关于甲骨文性质、内容的研究文章。1928年,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小屯进行科学发掘并发现有字甲骨时,甲骨文存在于殷商时期也就无可怀疑了。从此使中国古文字研究开始在新的基础上进军,许慎《说文》对中国文字解释的近两千年的权威性开始发生动摇。

第二,通过现代考古发现的许多史前遗址是过去旧史学家所完全不知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地系统记录小屯发掘情况,以及无论与刻字甲骨有联系还是无关的全部手工制品,当然还包括全部陶器和陶片。在近25万片陶片中,约可复原1500件完整的标本。笔者依据这批陶器资料呈现的器形及可分期的类型所编纂的《殷虚陶器图录》,脱稿于战争时期,于1954年在《中国考古

报告集》上发表。这一陶器群在新发现的史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与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二者之间建立了最坚实的联系。在安阳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小屯遗址中已被甲骨文确定时代的殷商文化层下,发现另一史前文化堆积,其内涵与广泛分布于山东和东部沿海一带的龙山文化极相似。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这一陶器群为研究小屯许多墓葬和侯家庄王陵出土的青铜礼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呈现两个特征:其一是大部分器形明显为西周初期所承袭,如鼎、鬲、觚、斝、爵、盂和盘等;其二,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器形在与其同时代或史前文化的陶器中找到原型。所以,两地墓葬中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实际上是人所熟知的周朝器皿的祖型。此外,安阳青铜礼器继承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形,清楚地显示了它与可能是祭祀用的史前陶器具有牢固的联系。

安阳发掘在文化、社会和地理等其他方面也是重要的。本书只将这些内容概要介绍。本书撰写过程中,蒙许多朋友鼎力协助。首先我应感谢研究所的同事们,无论在核对原始材料,重新考查出土物,还是查找文献目录方面,他们都全力协助。在美国朋友中,十多年来一直坚持阅读笔者在《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发表的所有英文文章的费正清夫人(费慰梅),阅读了本书全部原稿,并为使本书语言通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笔者的老朋友罗杰斯教授不仅对原文加工润色,还为本书写了序言。对此笔者深表感谢。

贾士蘅女士也给笔者以多方帮助,开始曾帮助笔者搜集原始资料,编纂参考书目,用打字机打正文和注释,最后又仔细审核全

部校样,笔者非常感谢她耐心而又熟练的帮助。对摄制全部图片的宫雁南先生也应致以感谢。史语所的领导人特许我使用了不少尚未发表的照片。对此,笔者也深致谢意。

李 济



## 序 言

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阳的发现史也就是从发现刻有中国古文字的“龙骨”开始的。所以李济先生叙述了此发现的获得情况的种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旦认识到所说的“龙骨”就是占卜者于其上刻写有求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以甲骨闻名了,于是掀起了积极寻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译成现代文的热潮。

多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问集中于对古典著作的精细考证,因此,许多学者渴望了解甲骨卜辞的内容。对这些字的正确解释需要把发现的甲骨与称职的学者所作的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全部记录结合起来。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的本行是读书,而视从事体力劳动于学习无益,因此,使安阳考察成为可能的社会需要和体力需要,必然要求学术界和社会来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国已为此作好了准备,若无这种社会和智力变革的新形势,安阳发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安阳考察计划产生于社会革命,而最终又以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为转移。

自始至终负责安阳发掘的李济先生为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已作好了准备。李先生在中国接受古典式教育后,又到哈佛大学深造并获人类学博士。当时,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很活跃,但他们主要

集中精力寻找远古人类和研究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李先生回国后，结识了那些正忙于探寻古代中国历史奥秘的外国杰出学者。李先生从事田野工作之初也是探讨新石器时代的资料，他很快就卷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即使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探寻、考释中国早期的文字记录。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一开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献和仔细的田野考古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所选择李济指导安阳发掘是明智的，因他受过两种训练，足以把研究仍处于传说中的中国早期青铜时代和把此时代置于中国信史的适当地位这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李先生现在是对安阳发掘的起因及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加以描述，并最后对一些考古学者从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资料中所获知识进行总结的最合适的人。

前两章中，李先生一开场就介绍了现代考古舞台第一幕中的主要角色，叙述了最早认识中药中的“龙骨”其实就是记叙早期青铜时代并把商朝引入信史领域的文献的一些人物的重要细节。

第三、四章中，李先生说明了20世纪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情景，并叙述了几个杰出的外国人的贡献。接着就是安阳发掘计划的制订，财政上的困难，他与弗利尔艺术馆的最初合作以及该馆与研究所的最后分手。

在第五章中，李先生开始叙述安阳的历次发掘，并描述了主要出土物。对安阳的工作，一年接一年地做了回顾，直至由于日本侵略而被迫于1937年停止。接着的几章介绍了日军进犯南京前史语所逃难的情况。他们历经漫长艰难的跋涉，携带着发掘的珍贵资料以及能搬运的图书技术器械迁到中国西部，于此也不能久待，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又得搬迁。这些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未挫伤

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研究所临时住址一经安顿,他们立即恢复对资料的分析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研究所返回原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了和平,但未给中国以和平。曾促使安阳发掘成为可能的那个智力和体力的革命在继续升级。研究所很快被迫迁往台湾,建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员,恢复了工作。

最后几章概述了安阳的种种发现及对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进行研究而产生的一些主要著作。像中国一切考古活动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李先生一直不允许因政治考虑而永远停止这个项目,或是用政治见解来渲染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种种发现,这是值得大大称赞的。

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的发掘,安阳是个典范,对那些继续从事中国考古的人也是个鼓舞。

米勒德·B. 罗杰斯  
华盛顿大学文学院



## 第一章 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7年(应为1928年——译者)在安阳开始科学发掘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商朝的甲骨文已为中国的知识界和少数欧美学者所知晓。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认识到对中国古文字学起了革命作用、并为在华夏大地上发展考古科学事业铺平了道路的这一新发现的重要性的呢?

田野考古学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当作墓地使用了<sup>①</sup>。证据表明,当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时,他们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的一些学者像19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发现了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国学者可能早在13个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这个假定根据的事实是现代发掘出来的隋墓;在覆盖这些隋墓的土层中,不止一次发现有许多刻字甲骨的碎片。我提及这一有趣的地层堆积,仅想表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着某种次序前后相接的阶段。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认识清朝的学术思想史是重要的,因为

---

<sup>①</sup> 关于小屯发掘的隋唐墓的讨论,参看本书第66页注<sup>②</sup>。



它提供了条件促使学者们得以达到了了解和承认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阶段。

清朝经学的两个学派,与这个智力阶段的成熟是有密切关系的。我想首先谈谈考据学的潜心研究。早在北宋时这种研究就开始了,但直到17世纪初才得以蓬勃发展。顾炎武(1613—1682)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位大师。追随他的有清初另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派,他们发扬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梁启超这位光绪变法运动领导人和近代中国文学改革的先驱者,把这种精神简要地总结为:“‘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sup>①</sup>除顾炎武外,梁还提到了这个运动的共同发起者阎若璩(1636—1704)。阎成功地证明,在一千多年里被人们视为像西方的旧约《圣经》一样神圣的《书经》,其中大部分是后来一些狂妄的经学家所伪造的。阎若璩的证明有力地促使考据学(或古典版本的校勘)成为经学的主流。以后戴震(1723—1777)是这个学派的领导人。追随他的是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如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吴大澂(1835—1902)。新运动的趋势主要是重新检验其他的经典。这种学术进取精神逐步扩大到对所有古代重要原著的审查。从乾隆到道光年间,这个运动发展到了高潮。

与此同时,伴随这一发展的还有古文字学(金石学)。大家知道,早在北宋时这种研究就开始了。虽然它几乎完全被后来的元朝、明朝所忽略,但到17世纪初期,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这个学派又复生了。金石学是学习校勘学的必修课,即不仅要求

<sup>①</sup> 《清代学术概论》,载《饮冰室合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页。